



《纵横》精品丛书

隐蔽战线

写真

看不见硝烟的战场上演
绎着血写的忠诚，智勇双全
的功臣们创造着不朽的业绩。

.....



《纵横》精品丛书

隐蔽战线写真

《〈纵横〉精品丛书》编委会 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隐蔽战线写真/《〈纵横〉精品丛书》编委会编.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2. 6

(《纵横》精品丛书)

ISBN 7—5034—1258—5

I. 隐… II. 纵… III. 中国共产党—地下斗争—史料 IV. D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39622 号

《〈纵横〉精品丛书》

隐蔽战线写真

《〈纵横〉精品丛书》编委会 编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 100811 北京太平桥大街 23 号

印 刷: 北京忠信诚胶印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4.9 字数: 321 千字

印 数: 4001—7000 册

版 次: 2002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03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

总 定 价: 240.00 元 (本册定价: 24.00 元) (全十卷)

本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承印厂负责退换。

内容提要和目录

这是一片看不见硝烟的战场，这是一块令人称奇的阵地。这里有血写的忠诚、过人的胆识、惊险的故事，这里笼罩着白色恐怖，有数不清的陷阱和危险。这里的人们智勇双全、不求名利却时时刻刻可能与死亡为伍，这里的工作容不得一丝一毫的失误。面对风云变幻的政局、扑朔迷离的斗争形势和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我隐蔽战线的功臣处变不惊，巧妙周旋，不辱使命。他们冒巨大风险乃至生命代价凝结成的这些文字或长或短，都是自身真实经历的再现。

党中央在上海的秘密印刷厂	钱之光 (1)
我将第五次“围剿”红军的计划转交中共	莫 雄 (14)
敌营十五年	李时雨 (30)
忆屡建奇功的西安情报处	王超北 (71)
我所亲历的“港岛救群英”	连 贯 (104)

2 隐蔽战线写真

邹韬奋脱险记	郑 展 (112)
策划山东伪军的首次起义	何庆宇 (122)
同蒲支队和敌后地下交通线	王立岗 (131)
草岚子监狱里的“OX”	张学德 (141)
我策划从敌人手中抢运军火	华克之 (145)
中共地下党员谢士炎的壮丽人生	陈融生 (159)
在陈毅领导下搞策反	裴先章 (172)
在敌人眼皮底下办《挺进报》	蒋一苇 (193)
智取巧送太原城防图	张全禧 (205)
杨靖宇、陈翰章遗孀寻觅记	李野光 (213)
1949：张澜、罗隆基幸免劫持的内情	陈新桂 (222)
我冒生命危险争取傅作义起义	崔月犁 (232)
破获国民党特务潜伏电台	杜济生 (245)
朝鲜战场反侦察	杜牧平 (257)

朱端绶等有着颇具传奇色彩的经历，新中国大厦的建立自有他们的一份辛劳。他们或打入敌人内部，或负责党的机要工作，或献身革命的统一战线，或担负极为重要的策反任务，或指挥捕获敌特的战斗，职责不一，贡献至大。这些文字虽不出自

这些英雄的回忆，但同样具有感人肺腑、动人魂魄的魅力。

革命的“老板娘”朱端绶	许晓闽 (264)
隐蔽战线上的奇人杨登瀛	苏智良 (271)
董健吾：一个拆人间地狱的牧师	张魁堂 (280)
隐蔽战线上的功臣于炳然	于天存 孙铁汉 (288)
华克之虎口脱险	沈美娟 (309)
杨虎城身边的共产党员	杨拯民 (315)
战斗在隐蔽战线上的“红色木匠”涂作潮	辛 平 刘 波 (334)
周镐策反孙良诚	阮银甫 (363)
活跃在西安的“党外布尔什维克”蒋自明	范作民 (373)
廖卓之智劝张奇弃暗投明	朱育超 (393)
1949：斩断伸向陈毅市长的黑手	史 鉴 (409)
军统特务“赛狸猫”落网记	少 吾 (417)
侦破“万能潜伏台”	凌 辉 (439)
侦破保密局北平技术纵队特务案	凌 辉 (446)
侦破保密局天津特别组特务案	凌 辉 (461)

党中央在上海的秘密印刷厂

□钱之光

30年代初，上海既是冒险家的乐园，又是白色恐怖笼罩的地方，中共地下工作者，以大无畏的精神，周旋于敌特林立的险境之中。钱之光领导的上海秘密印刷厂，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先后承印过党的许多文件和刊物，如《党的建设》、《红旗周报》、《实话》、《布尔什维克》等等，及时传达了党中央的各项方针政策，传播了马列主义。他们是如何与敌人斗智斗勇，终于完成党的各项印刷任务的呢？

20世纪30年代初，我在上海曾负责过中共中央秘密印刷厂的工作，时间3年左右。那时环境复杂，形势险恶，印刷厂是以极巧妙的斗争方式坚持工作的。在这段时间内，印刷厂搬了5个地方，但都安然无恙，完成了这个期间党的印刷任务。后来，我奉命去了中央苏区。

秘密建厂

1931年春，毛泽民、瞿云白（瞿秋白同志的弟弟）和我在上海筹办秘密印刷厂，这个厂在齐物浦路周家嘴路元兴里146号至147号。印刷厂有两楼两底的两幢房子，紧紧挨

在一起，对外是两家，即一边是印刷厂，一边开了一个绸布庄。瞿云白负责印刷厂内部的工作。我一方面负责印刷厂对外的的工作，同时还管理绸布庄的事情。我那时改名徐之先，由毛泽民同志领导。

我们之所以选在这里搞印刷厂，是由于这里的房子和环境都合适。印刷厂的前面是个工厂，他们开动机器的时候，轰鸣声正好掩护我们印刷机的声音。另外，印刷厂的旁边是一块空地，行人很少；一边是我们的绸布庄，可以挡住一些声音；后边是稻田，无人行走，因此印刷机的声音不易被人听见。即使这样，我们还不放心。为了使声音更小，我们还加厚了印刷间的墙壁，增强隔音程度。这种修改印刷间的工作，我们后来每到一个新地方都是要做的。有时是用砖把印刷间四周墙壁加厚，门窗也作了装修，减低声音的传出，有时是用木板加厚的。在改修时，不破坏原来的结构，外人看不出破绽。后来有个地方，印刷间在灶披间，我们在四周加了一层砖，把门也堵死了，进出从屋里的窗户走，很像是储存货物的仓库。

印刷厂那边住瞿云白夫妇，以住家的形式掩护印刷厂。一进门是个小天井，天井进去是客堂，客堂后边是后堂，印刷机就安放在这里。再后面是灶披间。从客堂到印刷间和灶披间，不是从堂屋中穿过，而是从屋里旁边的走廊穿过。楼上除住了瞿云白夫妇外，还作包装、装订用。

当时，我们只有一台四开的脚踏印刷机，排字不在这个地方。搞印刷的是施有章和赵锡群两人，瞿做些校对工作，他夫人徐伟成除做些家庭事务外，也做些包装、装订工作。

绸布庄这边住着我的一家，以夫妻店的形式掩护印刷

厂。还有一个交通同志，是四川人，姓江，负责秘密运送报刊，公开身份是绸布庄的伙计，也住在这里。

绸布庄经营批发各种绸缎布匹，是专门为掩护印刷厂开设的。为了印刷厂的安全，绸布庄还装有电铃开关，电铃安在印刷间，外面有人进店铺里来，就马上按开关，让印刷间的人知道这边有外人，立即停止印刷，以免人家听见印刷机的声音。我们发现意外情况，也是按动约定的电铃号记，使印刷间立即采取紧急措施。此外，印刷需要的纸张和要印的稿件以及印好的印刷品，也是经绸布庄进出的。因此，我们在楼上的墙壁根部，把踢角搞成活的，可以取下来、装上去。平时装上它，还用衣柜挡住，看不出痕迹来。印刷用的纸张，伪装成绸缎布匹，运进布庄，再传送到印刷厂；印好的东西，由我们伪装好后，也从这里送出去。

这年4月，中共中央负责保卫工作的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叛变，他知道的事和认识的人很多，因此危及到我们的许多负责同志和机关的安全，迫使中央立即采取了隐蔽、转移、改变斗争方式、更换接头暗号等等措施。毛泽民是要转移的同志之一，端午节后他便去了香港，我们的印刷厂就改由左觉农联系。

顾顺章叛变后，领着国民党特务到处抓人和破坏机关，使本来就阴沉沉的上海，又乌云翻滚，杀气腾腾。我们秘密印刷厂的工作就更艰难了。因为我党历来很重视出版发行工作，需要它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和主张，发动和组织群众。这使国民党很恼火，成为他们要重点破坏的对象之一。这个时期，国民党加紧戒备，到处设卡，我就遇到过“抄靶子”的。那时，党为了掩护我们工作，还要我同时兼管鸭绿江路

一家丝绸厂的工作。这个厂是中央的一个联络点，经理是个杭州人，叫江阿明，是我们的同志，厂里的具体工作由他负责。我每个星期去一趟，一是看看那边的情况，一是与上面取得联系。一次，我去丝绸厂回来，路过黄浦江边，遇上了“抄靶子”的，要是往回走，很容易引起他们的怀疑。好在我那天是穿西装，一身阔人打扮，我便大大方方地走了过去。他们看看我，又互相看看，见我的气派和模样，便没有检查就让我过去了。

鉴于形势有变，我们准备搬家。不久的一天上午，在我们附近的小菜场发现一个叛徒，组织上决定让我们转移，很快我们就搬了出来。

重起炉灶

撤出后，我们分散住在几个旅馆里，我便找新地方。很快看中了梅白克路的一幢房子，此处现在改名为新昌路 99 号，即凤阳路口处。这幢房子是在新建的一排房子之内，还没有住过人。外面有一道铁门，是横拉开的铁杆门，然后才是一道木板门，我们又加装了铁栅栏，只要几道门一关，是比较严紧的。后面不远正在新建 20 多层楼的国际饭店，整天施工，机器声、打夯声、号子声连成一片。这里是繁华的闹市区，附近有电影院、跑马厅；前面是一条横街，左右是弄堂，四通八达，进退十分方便。租金虽然高些，但这一切很有利于我们搞秘密印刷厂。

房子选定后就是搬家。在那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印刷厂的转移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像机器和一些设备的搬迁就极为困难。这次搬家以及后来的搬家，我们都是想很多的办

法，以多种形式搬迁印刷机和设备；往往是在转移时先把印刷机和设备搬出来，放在我们的转运站，作短暂的停留，再搬到新的地方。有时，要在中途转停几个地方，才搬到新地方。搬迁时，还得把印刷机拆散装箱，外面用草绳缠好，怕搬运时碰坏了机器，在木箱上再写上某某商号收的字样；用板车或其他办法运送，我们还派同志随车搬运。到梅白克路后不久，排字房也从别的地方合过来了。铅字的搬运是用木箱和藤箱装的，木箱不能太大，装多了抬不动，藤箱装的也不能多，里面还放些刨花和衣物等作伪装，提在手上，像是旅行回家的样子。当时运用的这些对付敌人的办法，在现在看来不足为奇，可是在当时的斗争中是起了作用的。

在这里，我们开设了一个烟纸杂货铺作掩护，经营些香烟、笔墨、纸张、手绢、钮扣、香脂、热水瓶等小百货，还兑换银钱。对于这幢房子，我们也作了合理的安排：第一层是烟纸杂货铺，铺面紧靠大街；一到夜间，两道铁门和木门关上，在木门上开了一个小窗口，有人敲门，就打开小窗口探视，是买东西的，就从这个窗口营业；是不三不四的人，我们就采取措施对付。铺面后面，隔了一间小屋，住人守夜。第二层有三个房间，是个拐角形，楼道上去的左边是我住的，右边住我的家属。我家的后面是个厨房，厨房隔壁有个小屋子，后来何叔衡同志的大女儿何实楚（又名石楚）就住在里边。三楼是排字、印刷、装订间，还住有印刷厂的人。这个地方的地形、环境都较好，印刷厂的规模也比以前大了，人员也多些。原在齐物浦路工作的同志，除瞿云白夫妇和姓江的交通员调走外，其余都过来了。先后还调来了杜延庆、杜梅臣兄弟俩，霍彤光和石楚、石之姐妹俩。石之是

杜延庆的夫人。我们的分工是：我是以烟纸杂货铺的老板身份秘密负责印刷厂的工作，施有章和赵锡群仍是搞印刷；杜梅臣作浇铸、印模、制型板；杜延庆、霍彤光等搞排字工作；石楚、石之做装订、包装工作。店铺里缺乏人员，我找了两个人来，一个是钱宝林，另一个是钱广才，由他们负责店铺的生意。这两个人我早就熟悉，他们也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后来钱宝林和我一同进的苏区，他在苏维埃粮食总局任副局长。

在这里，我既是老板，又是二房东，这幢房子是以我的名义全部租下来的，又出租一部分给别人住。这样，印刷厂如果出了什么事，有个缓冲余地。我这个“二房东”表面上与他们没有关系，出了问题就可以多掩护几个同志，减少损失。

在此工作期间，正赶上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淞沪战争，我们的印刷任务也随着形势的变化加重；加之，中文印刷复杂，从排字、制版、浇铸到印刷，过程较多，而我们人手少，只得分工又合作，彼此互助。例如，搞排字、打印模的，还要做装订、包装工作；我有时也去做校对工作。但这都不能满足印刷任务的需要，同志们希望把脚踏印刷机改为电动的。后来，施有章提出，搞一台电动机来改装一下就可以。于是，我们买来了两相电动机，利用屋里的电灯线路，使脚踏印刷机变成了半自动的电动印刷机了，这就大大减轻了劳动强度，提高了工作效率，要运进送出的东西也就增加了。为掩人耳目，我们有时装成运送货物的样子，用老虎车把纸张运进来，把印刷品运出去；有时用藤箱、皮箱，上面放些衣服日用品之类的东西，把印好的文件、书刊放在中间

或箱子底下；有时用网篮，把印刷品藏在里面送走。

我们在梅白克路一直工作到1932年夏天。一天，一位同志回来说，他在弄堂口听到里弄里的几个妇女在说，好像听到有什么声音。此事引起了我们的警惕，经过集体研究，决定暂停印刷，人员疏散。接着，我们找了新地方，又搬了家。

屡迁新址

这次我们搬到了麦特赫斯脱路386号，这是我们搬的第三个地方，是幢3层楼的新房子。来这里以后，我们准备筹建一个洗衣作坊作掩护，利用接收送洗衣服的条件，取送印刷的纸张、文稿等。由于环境和工作的因素，搬家时又把排字工作分开了，搞排字工作的杜延庆、霍彤光、杜梅臣、石之、石楚等人也一块调走了。其余包括烟纸杂货铺的人，均转移过来工作。机器安装好以后，开始试机印刷，我们便到房子周围去听听机器的响声，结果听到机器振动的声音很大。我们分析了这幢房子是钢筋混凝土结构，而且是整体设计的，容易传声，虽然作了种种隔音措施，但还是没有解决问题。因此，我们放弃了这个地方，又搬到了武定路。

武定路的房子很好，是西式洋房，房间布置也讲究，周围的人都认为我们是有钱人，门牌号码是181弄12号至14号。我们除赵锡群没有过来以外，又新调来几位同志：一个是姓杨的湖南人，和施有章一块搞印刷；一个叫谢素珍的女同志和一个姓张的女同志，她们做装订、包装工作；还调来一个交通，记得是扬州人，他的夫人扮作是我们的娘姨。后来我们发现这个交通老是擅自行动，尤其是夜间出去很晚才

回来，不知到底干了些什么，使人很不放心。搞地下工作的交通人员，是严禁擅自行动的，由于他违反了纪律，组织上把他送到苏区去了。由于人事变动，不便在这里继续工作，我们也只好再次搬家。这是我担负印刷厂工作期间的最后一次搬家，地址在北京西路张家宅路 73 弄 48 号，是个拐角。前面出门便是张家宅路，其余三面是空地，后边是很大的一片田地。到这个地方已是 1932 年冬天，安顿好后就过春节了，到处张灯结彩，鞭炮齐鸣，我们趁此机会印了不少东西。有一天，我们店里的人也装着凑热闹的样子，买了些鞭炮在天井中放，以迷惑外边的人。隔壁的人家可能嫌吵闹，出来关窗户，我们发现她曾经在我们的一个转运站住过，相互都认识。由此我们推想到，隔壁也可能是我们党的一个机关，但与我们没有发生什么关系。在当时秘密的情况下，党的两个机关住在一个地方，是不恰当的。经过研究，组织决定，停止印刷。

在此期间，我向组织提出：我在上海工作好几年了，熟人太多，不便继续在沪工作，请组织考虑让我到苏区去。组织上考虑了我的意见，一位姓周的同志和我接头谈话，说经过研究，组织上认为我的要求是合理的，同意我去中央苏区，让我做好准备；还决定印刷厂的那位杨同志和钱宝林与我一同去苏区。

硕果累累

这个时期内，我们和中共领导的别的印刷厂根据国内外形势和中央的方针政策，以及供应苏区精神食粮的需要，印刷了不少东西。但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了，很难全部准确地

记忆起来。大致还记得，我们印过党的文件和《红旗周报》、《党的建设》、《实话》、《布尔什维克》等党的机关刊物；还配合当时的形势和支持罢工斗争，赶印过文件，也印过中央苏区来的东西。

《党的建设》是1931年元月25日创刊的，它是党的机关刊物，与《布尔什维克》、《实话》、《红旗周报》不同的是，它的主要任务是代表党中央指导各级党组织和全党同志，怎样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组织原则和实际工作方法，以完成中国共产党的建设。这时，正是反立三路线时期，登了好些反李立三的文章。还登了些马、恩、列有关建党学说的理论。这个刊物只有现在上海的《支部生活》那么大，厚薄也差不多，有时薄一点儿，但纸张没有那么好。为了蒙蔽敌人，封面都是伪装的。记得我还设计过一个封面，是个美女像，头上从右至左四个艺术字——摩登周报，下面是摩登周报社几个字。封底是广告，像中华第一针织厂的菊花牌袜子广告就登过。但这不是我们接受的广告业务，而是从别的刊物上搬过来伪装我们的刊物的。

《红旗周报》是1931年3月9日创刊的，也是党中央的机关报。创刊号上登载了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发布的几个法令草案。编者有段按语是这样说的：这是中国革命史上非常重要的事，第一次宣布了代表工农兵利益的苏维埃政府的法令草案，与国民党的有天壤之别。不久，又改成了三十二开那么大，用别的刊物的封面和封底进行伪装，并且经常更换。比如这一期可能是《实业周报》第哪一期，系上海实业周报社出版，有某年某月和中华邮政认定新闻纸类特准挂号等字样，下一期可能就是《光明之路周报》的封面了。还用

过《潮》刊的封面，“潮”字在右边靠上，左边是一个黑五星，下边是大海的怒潮；还用过《钟晨》的封面，等等。封底有时是广告，有时是与封面相关的图案。

《实话》创刊早一点，是1930年10月创刊的，它是中央有关政治、策略的机关报，有小四开纸那么大，是10个版面的报纸。

在我们这里还印过《布尔什维克》杂志，是当时党中央的理论机关报，出版的时间也比较长。

苏区来的文件、文章就经常登在以上这些报刊上，像博古、洛甫、王稼祥、凯丰等都经常有文章发表。1931年11月以后，毛泽东当选为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副主席是项英、张国焘，以他们的名义常在这些报刊上发布指示、训令。我还记得洛甫写过这样的短文，说江苏省委与中央有不同意见，这是一个误会，讲清楚就好了。将来有意见要讲清楚……

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三天，我们就在《红旗周报》上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后来，围绕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揭露蒋介石不抵抗政策，号召东北人民团结起来，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坚决还击日寇，收复失地……刊印了不少文章。像《中共中央为以民族战争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与瓜分中国告民众书》就在《红旗周报》上刊印过。

由于我们党的秘密印刷厂能够坚持工作，不断地把党的方针、政策和主张广泛宣传，对于打击敌人、教育人民、号召群众起来斗争，指导我党各级组织坚持战斗，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奔赴苏区

我是1933年春夏之交离开上海去中央苏区的。临行前，组织上交给我们每人一块肥皂，说这是与组织接头的一个暗记，让我们到苏区后交给组织。同去的有印刷厂的杨同志、钱宝林，护送的是党的秘密交通员阿曾。我们路经汕头、潮州（即潮安）、大埔、清溪乡到才溪进的苏区。从上海到汕头是坐英国太古洋行的轮船，到汕头后改乘火车到潮州，从潮州坐小轮船到大埔。到大埔时天还未亮，本地人都下船了，我们人地生疏，言语不通，不敢贸然下船。我们商量了统一的口径，扮作收买香菇的客商，由阿曾先下船。他找来了一条小船，我们连人带行李过到小船上，这时，我们的精神才轻松些。在小船航行的路上，阿曾说，我们总算安全地到了这里，很快要分手了，这以后由本地的交通员护送你们，不两天就要进苏区，我们到前面去买点肉来会个餐，你们进了苏区就不容易吃上了。看来阿曾的任务到此就完成了，可我们不知道还要遇上什么风险。

小船到了清溪乡，阿曾领我们来到一户靠河边的人家，稍事休息，便上了后面的大山的草棚里隐蔽。这个草棚是老乡看庄稼用的。和当地的同志联系上后，他们告诉我们，国民党正在调集重兵向苏区进攻，白天晚上经常挨户盘查，地主民团也很猖獗，让我们隐蔽好，不要出来，有什么情况，他们会来告诉的。连饭也是他们送来吃的。

到了晚上，他们派了几个人护送我们，都带着驳壳枪。在此与我们同行的还有姓戴的夫妇俩。交通同志说，他们也是上海来的，前往苏区，安排我们结伴同行。为躲避敌人，